



社科论丛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 城市社会学研究

——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

张宝义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912.81
157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 城市社会学研究

——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

张宝义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 / 张宝义著. -- 天津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80688-961-9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城市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584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www.tssap-tj.org.cn

印 刷：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7

字 数：28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专家鉴定意见(一)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宏大而又深刻的城市化转型。过去 30 多年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城市的空间面貌。城市中的写字楼、住宅小区、商业化小区和不断向外延伸的环城路快速地吞噬着郊区的土地,并同时将昔日在地上耕作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中城市,在异地的城市中获得他们的就业岗位,完成他们的高等教育,进而在异地的城市中定居。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各类移民的不断涌入,在推动城市人口和空间都不断扩张的同时,也使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改变,而且还给城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导致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结构和各种社会关系发生着重构和重组。不同的阶层在城市中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位置,并且在动态中调整着其空间位置;每个人也在努力地通过获得空间位置而实现其事业的目标和获得其生活的满足。因此,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具有很大的社会学意义,它要求城市发展的规划者和城市的管理者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社会管理,同时也要求社会学者们将城市空间的变化纳入到其研究的视野,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管理及社会服务的出发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宝义研究员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社会学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这本有关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学术性专著对这一领域做出了带有一定开拓性的研究。

首先,对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社会学源于西方,其形成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标志,早期的城市社会学是基于人类生态学理论发展而成,它虽然在 1949 年前就传入中国,但是学术界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深入研究。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段时间,由于中国实行的是非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应研究缺少社会基础,基于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使基于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开始萌生,加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以及中国目前的大规模城市化现实,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繁荣现象。但是,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各种理论并用,观点各异,学科涵盖十分模糊,缺乏较为清晰的研究路径。张宝义的研究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弥合,该书以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在吸取国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进行了一定整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的逻辑整体,这为今后中国城市社会学的深入探究创造了有益的基础。

其次,研究成果具有较为严谨的内在逻辑性。该成果共有六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的研究彼此密切关联,主体性十分鲜明。作者在开始部分对当前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型过程给予关注,并通过空间理论的简要介绍,为本书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成果的第二、三、四部分分别探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大主题,即空间分异、空间扩张、空间更新,以及其带来的对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及相关问题的影响。之后通过第五部分空间正义的探究,提出了空间权利以及空间平等的价值逻辑,对中国城镇化价值追求进行了应有的反思。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即对空间混合居住的探讨,实际上是对上述部分的一个总结,将研究落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层面,由此使得以上研究具有了十分严谨的内部逻辑,增强了研究成果主题性和完整性。

应当指出的是,张宝义研究员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观点。一是作者认为与西方政府相比,在城市空间的资本运行中,中国的地方政府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或被认为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城市发展被地方政府用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由此使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空间的快速优化与提升,并使之符合经济效益的规则。特别是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与土地开发商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利益和权益则被政府严重忽视,成为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二是作者对中国城市极化空间发展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创建,如认为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队伍规模尚小,难以担当空间过渡的角色;中国富人的炫耀性消费促使极化空间的扩展;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客观上推进了穷人在空间上的不断聚集;“城中村”改造难以改变其作为贫困者聚居区的功能等。

总之,该成果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中国城市社会学框架建设有所裨益,达到了预期研究目的。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 教授 关信平

2013年5月10日

专家鉴定意见(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关于空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西方的社会学、建筑学、地理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各学科的重视。他们认为空间既是一种“产物”,也是一种“力量”。空间是由于人类的各种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并具有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生产生活之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以前未有的速度发展,而且在可预见的今后几十年,将是中国城市化继续大发展的时期。城市社会学将越来越成为社会学中的显学。所以城市社会学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吸收和借鉴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提出的新问题,开展适切研究,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实践性问题,为中国社会建设服务。因此将空间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镇,从多年以前即开始对城市空间、社会空间的研究,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

张宝义研究员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一书,是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相关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该项目研究分为六个部分,可以概括为空间转向、空间分异、空间扩张、空间更新、空间正义、空间混居。从成果内容看有如下几个特色:

1. 对本土城市社会学研究进行了较好的梳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进入了相对繁荣发展的阶段,期间大量研究成果及各种观点纷纷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及观点,对于促进中国特色城市社会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以上研究成果的学科视角多样,依据的理论基础各异,使得研究成果呈现出纷杂的景象,需要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必要的梳理,以此使学科“领地”更为清晰,学科“逻辑”更加明确。本课题研究正是基于以上目的进行的。从梳理的效果看,由于思路较为清晰,并依据了较强的理论逻辑,使成果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2. 突出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目前传统城市社会学面临新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挑战,挑战的核心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理论的运用,使传统城市社会学赖以存在的人类生态学研究面临窘境。而这种空间转向又是历史的必然。为此,作者在课题研究中承接了这种转向,通过以空间理论的价值逻辑为指导,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由此使该课题的研究站在了学科研究的前沿,也由此突出了研究的主线、思路,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参考视角。

3. 突出了实证性研究和借鉴性研究的特色。本课题的研究旨在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实证性的“抽象”与归纳,因而研究过程参考和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性文献资料,内容十分充实和丰富,这使课题的研究内涵较为充裕。此外,课题在研究中强调了研究的借鉴性,即对西方的研究理论与实践进行吸取和鉴别,以使其研究成果成为认识中国城镇化发展以及构建中国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有益基础。

4. 突出了课题研究的学术单纯性。课题研究中所引述的文献及观点,均来自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坚持了从学者到学者的程序规则,由此维护了学术研究的价值,避免了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和“干扰”,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学术纯洁性。

5. 回答了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相关问题。如中国城市分异中的阶层矛盾与对立,城市扩张中的非公正性剥夺,城市更新中的群体博弈等。课题对以上众多城市社会问题进行了空间视角的解读与分析。

课题的研究方法采取的是文献方法,即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与抽象、归纳,并按照作者的价值逻辑进行系统建构,最终形成独立的、有机的学术性表述。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对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城镇化社会问题研究进行符合空间演变逻辑的再综合、再表达,并以此彰显其学术独特性;此外,课题研究中的许多内容与结论对当今中国城镇化进程有借鉴作用和实践意义,如城镇化的价值准则,保障性住房混合建设等。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处辉

2013年5月9日

目 录

绪论: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1)
一、城市化与空间生产	(1)
(一)城市化与空间的发现	(1)
(二)空间生产的理论	(4)
(三)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	(6)
(四)空间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8)
二、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9)
(一)传统城市社会学的兴盛与局限	(9)
(二)新城市社会学的突起与挑战	(11)
(三)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整合	(11)
(四)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范式	(15)
三、基于空间演变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	(17)
(一)空间演变: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17)
(二)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逻辑	(18)
(三)本项目研究的基本任务	(20)
第一章 空间分异:社会的分野	(23)
一、中国城市空间的分异	(23)
(一)空间分异的理论表述	(23)
(二)中国城市空间分异之趋势	(26)
(三)分异的形成及解读	(30)
(四)分异的社会后果	(34)
二、中国城市空间分异的实践	(36)
(一)北京	(36)

(二)上海	(40)
(三)广州	(46)
(四)南京	(50)
(五)其他城市	(54)
三、空间隔离与社会分化	(56)
(一)居住隔离	(56)
(二)阶层隔离	(61)
(三)极化社区	(64)
(四)门禁社区	(69)
四、中国底层社会的空间剥夺	(81)
(一)乡缘社区	(81)
(二)失地农民安置区	(83)
(三)蚁族区	(87)
第二章 空间扩张:城市对郊区的侵入	(90)
一、城市郊区化及其社会影响	(90)
(一)世界城市发展的城郊化趋势	(90)
(二)西方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影响及问题	(95)
二、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及社会效应	(100)
(一)中国城市的郊区化及其动力	(100)
(二)城市郊区化过程的中国特色	(107)
(三)郊区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110)
(四)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理性选择	(114)
三、“村改居”——过渡型社区的形成	(119)
(一)“村改居”与“过渡型社区”的形成	(119)
(二)过渡型社区的空间属性	(121)
(三)社会管理的问题与困境	(124)
(四)社会治理与归宿	(127)
四、“城中村”——被城市包围的村庄	(131)
(一)“城中村”的空间形态	(131)
(二)“城中村”——作为空间的生产与功能	(135)
(三)失序空间的困境	(139)
(四)和谐空间的治理	(143)

第三章 空间改造:城市更新中的博弈	(148)
一、城市更新的“前车之鉴”	(148)
(一)美国城市更新中的教训	(148)
(二)直面中国城市更新的现实	(156)
二、“绅士化”运动的中国再现	(160)
(一)“绅士化”运动的借鉴	(160)
(二)绅士化运动的社会效应	(166)
(三)中国的类“绅士化”运动	(170)
三、中国旧城拆迁中的博弈	(177)
(一)旧城拆迁中的冲突	(177)
(二)博弈主体以及之间的关系	(179)
(三)博弈的利益取向及机理	(181)
(四)博弈的方式	(187)
(五)博弈的利益平衡策略	(193)
四、“钉子户”——弱者的博弈	(197)
(一)中国的“钉子户”现象	(197)
(二)“钉子户”的资本与策略	(198)
(三)“钉子户”利益冲突的实质	(199)
(四)“钉子精神”与权利价值	(203)
第四章 空间正义:权利的空间诉求	(209)
一、空间正义的辩证	(209)
(一)空间正义的涵义	(209)
(二)空间正义的思想流向	(214)
(三)“差异性团结”——超越隔离的正义范式	(216)
二、空间正义与中国城镇化发展	(220)
(一)正义缺失的中国城市	(220)
(二)空间正义——中国城镇化的价值准则	(222)
(三)空间正义的政策取向与推进	(225)
第五章 空间混合:社会阶层的融合	(228)
一、混合居住——从理论到实践	(228)
(一)混合居住的缘起	(228)
(二)混合居住的异议	(230)
(三)西方的探索与实践	(233)

二、空间混合的中国尝试	(235)
(一)必要性的认识	(235)
(二)“大混居、小聚居”——一种模式的认同	(237)
(三)中国的尝试与行动	(239)
三、空间混合的适用性方案	(242)
(一)保障性住房的混合建设	(242)
(二)城中村改造中的混居适用	(245)
参考文献	(248)
后记	(261)

绪论: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传统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论述总体上是零碎的、分散的。片断式的表述凸显了空间社会意识的缺失,除齐美尔强调空间的社会性高于自然性,指出空间应归结为人的心理效应,其他学者均认为空间只是一种给定的外在场景,社会行动的特征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或利用。即便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处于顶峰的芝加哥学派,也将空间视为独立的、纯粹的、客观的研究对象,仅从生态决定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缺乏对空间背后社会动力的深入探究。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学没有建立起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话语。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探索及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空间转向不是简单的切换和转变,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城市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和理论拓展。城市社会学的这种空间转向,对于我们认真审视中国城镇化的理论及现实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且成为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一、城市化与空间生产

(一)城市化与空间的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但从50年代到70年代,法国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迅速转变为以工业和城市为基础的国家。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现代化过程带来的剧烈社会变动,特别是城市化过程引发了列斐伏尔的浓厚兴趣和深入思考。

列斐伏尔的家乡在法国的比利牛斯山脉朗德省,50年代的朗德省出现了石油联合企业。在他家乡纳瓦朗小镇不远的拉克地区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一个名叫穆朗的新城被兴建起来。在他看来,新城穆朗与纳瓦朗存在着巨大反差。

田园牧歌式的景象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消失殆尽。现代化新城的均质化单调与往昔田园牧歌景象形成鲜明反差,城市生活的异化给了列斐伏尔巨大的震撼,迫使他去思考城市和空间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新城穆朗是展示现代性的典范,其中没有历史,没有时间,没有过去。这种城市是技术专家进行空间规划的产物,完全以国家资本主义利益为中心。随着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和扩展,技术专家们的城市规划急剧发展,传统的城镇被摧毁。城市化呈现出一种堕落的过程,因为城市和郊区的均质性以及生活的单调抹杀了传统城镇公众生活中的自发性和游戏品质。

在1960~1970年期间,列斐伏尔承担了政府资助的城市研究课题,这一时期他做过不少关于城市、建筑与空间的讲座。他认为法国“二战”后急剧的城市化发展作为一项新的社会政治事件带来了某种危机。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被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城市规划的实践和技术以科学性为基础,这赋予了城市空间的一种客观假象。技术专家设计的规划,用抽象、归类和排列等手段掩盖了空间的政治性,把空间当作客观容器,掩盖了其操作的意识形态。

“二战”之后法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故乡纳瓦朗的变化,作为一种创伤性的现实触发了列斐伏尔对城市和空间的思考,迫使他开始反思“披着科学的伪装”的城市规划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逻辑。

列斐伏尔认为,技术专家的空间规划忽略了“为了谁?通过谁?为了谁的利益?”等关键性问题,以一种“披着科学的伪装的方法”为国家资本主义服务。它把空间当作一种纯粹的客观形式,假设了某种先在的总体性。他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①。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逻辑,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要求对空间进行管理,因而应该揭露它。通过对这种伪科学的空间规划的批判,他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②随着这一转变,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③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空间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并且空间已经是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的一部分了。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互

^① [法]亨利·勒菲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② [法]亨利·勒菲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③ [法]亨利·勒菲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重叠延续的阶段：“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① 在资本主义的城市阶段，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能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发对空间和城市问题的反思，让列斐伏尔发现：20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重组空间、创造出新的空间来消灭空间的限制，通过占有空间获得了发展。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的实质是围绕城市中心而产生的日常生活，尤其表现为前资本主义城市那种人口聚集的状态。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依赖于城市中心的空间形式来实现，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中心已经随着其功能的变化和大都市区的扩展而分化，妨碍日常生活关系的有效再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矛盾。由此，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部分根源，就是传统城市空间中心的消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城市化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通过空间规划来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构成了新的异化。

20年代，列斐伏尔曾在巴黎当过几年出租车司机。戴维·哈维认为，正是这段出租车司机的经历和体验，使他不再接受那种哲学的象牙塔式概念，不再把哲学看成一种远离现实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他对空间问题和城市本质的认识。

1968年之后，列斐伏尔开始集中研究城市和空间问题。列斐伏尔被称作“五月风暴之父”，他当时在巴黎大学南特尔校区任教，那里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在《从南特尔爆发到高潮》中以反思性笔记记叙了这一亲历的革命事件。从1968年到1974年出版的七部关于城市和空间的著作，可以说是对他运动失败的理论反思。学生运动首先在巴黎郊区靠近贫民窟的南特尔大学爆发，巴黎的巷战使列斐伏尔认识到都市空间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必须反抗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异化。

列斐伏尔在60年代开始思考空间问题，这并非偶然。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学术和政治就是生活，主张将生活当成一项事业，对城市和空间的思考及成果——空间生产理论正是这种理解的体现。他说：“有人选择其他梳理现代复杂世界的方式，比如文学、无意识或语言。我选择了空间，我的方法前后一贯，

^① [法]亨利·勒菲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概念之中,我要努力揭示其全部内涵。”^①面对战后法国现代化导致的社会现实问题,他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框架内,糅合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尼采非线形历史观、超现实主义等理论资源,结合自己对城市和空间的切身体验,试图用空间来熔铸日常生活、异化、城市状况等问题,空间生产理论就是其理论成果。^②

(二) 空间生产的理论

一些学者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促使人们思考和探索空间生产的社会因素,并且形成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列斐伏尔摆脱了空间的静止观念,认为空间是具有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③因此,列斐伏尔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④在他看来,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但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这个事实却未获认知,社会以为他们接受与转变的乃是自然空间”。^⑤为了更清楚地认识空间生产的真相,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生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而是一束关系,一个政治过程,列斐伏尔说,“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⑥因而,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一个各种利益不断角逐的产物,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制约及权衡。列斐伏尔进而分析道:“……如今看起来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的,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假如空间的内容有一种中立的、非利益的气氛,因而看起来是‘纯粹’形式的、理性抽象的缩影,

^① [美]爱德华·索亚著,陆扬等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② 杨有庆:《城市化与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空间转向”探析》,《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③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④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26.

^⑤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⑥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则正是因为它已经被占用了，并且成为地景中不留痕迹之昔日过程的焦点。”^①

在列斐伏尔的笔下，空间是有意图和有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它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空间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与空间相关的一切，都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人们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这样，空间便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② 城市规划成了列斐伏尔分析空间使用的政治学意义的案例。他写道，“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一种巨大而且帷幕重重的操作。以一种令人怀疑的科学追求着它的目标和客观性……城市规划显然是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种混合”。^③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规划的设计者置身于主导性空间之中，对空间加以排列和归类，以便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城市化”，特别是设计者在卓有成效地拥护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矛盾重重了。

列斐伏尔不仅揭示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因，还提出了空间的功能与类型。他总结了资本主义空间的种种功能：“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空间是一种消费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因此，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④ 列斐伏尔还运用不同的概念构建了社会空间的类型学，如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在列斐伏尔使用的空间概念中，包含了三个层面，即空间的三重性：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这三个层面是三位一体的，列斐伏尔赋予其三个特征是体验的、感知的和想象的。“空间实践”指的是发生在空间且跨越空间的相互作用，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人

^①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② M. Gottdiener. *New Urban Sociology*. NY: Mc Graw Hill Companies, 1994:49.

^③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④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的活动的成果,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空间的表征”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指被图形与符号以及生活在空间里的人们赋予生命力的空间。这些图形与符号的作者——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以叙事的手法表现的一个空间。它不仅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一些艺术家的空间。^①

(三)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空间渐渐成为审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视阈。在空间认知范式的作用下,建筑学、地理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学科呈现出相互渗透的趋势,在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形成了关于空间的共识:“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②有学者指出,目前西方学界对列氏空间思想的接受有较大差异。法国学术界主要从他的城市社会学角度来接受,认为其代表作是《城市的权利》,而美国学术界倾向于从地理学和文化研究等方面来接受,认为其代表作为《空间的生产》。^③

法国学者曼纽·卡斯泰尔结合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对列斐伏尔提出的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问题进行了深化性研究,他把城市空间看作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列斐伏尔从生产维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对空间进行生产管理的实质,卡斯泰尔则从消费领域入手,通过对集体消费的分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卡斯泰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主要功能是经济,而在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三个要素中,城市最主要的功能则是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集体消费。因而,他将城市定义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并选择了“集体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由于集体消费品投资无利可图或回报太慢,资产阶级不愿从事其生产,导致劳动力再生产需要与再生产劳动力必需的集体消费品供给不足的矛盾,使得政府成为集体消费品的主要投资者,其结果是政府的干预越多日常生活越倾向政治化。他认为,围绕集体消费展开的冲突,已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与城市空间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爱德华·索亚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个层次——即“空间实践”、“空

① 林晓珊:《空间生产的逻辑》,《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2期。

② 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③ 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